## 我生命歷程中的余英時老師

引调了 Extroduction) 及其他相同竭力·帕氏的情景的 《字教社序》》(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1964)正了的 推斯语(Karl Jaspers)在《歷史四起序歌儿歌》(The 如所用知有例如以时文)、神实的一套说话用 breatthrough")、即是本考整建構製的餐路。 处的朝心极层尚未普遍流行。我至上述事谕中研 Origin of History) · 書中日成提出的· "哲学的突破」在本書中山律故作物心完破 经色》其中南四即题作"重要的实旗。( "Missophic (種口至本,一九四九) 食化了這是我的便者先支代的问题。 ("Axial break+hrough")·看什好原的男子也一 原以故粮成品。常时成的用"其苦口安破一词则传 他的"抽口情代(程)食品译为"枢纽对代)"即"然而小 一起七年我接写《中國古代知識時房日興起與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见我必为英译本音的 的機勢而發生公前第一個 未完,为好三松多,在为村子之成了之人

余英時師《論天人之際》一書寫作過程中的部分文稿,由我請學生協助打字。 這份稿件後來成為〈代序:中國軸心突破及其歷史進程〉的上篇「中國思想史的開端──比較文化史的探索」。

## 陳弱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古今論衡 第 37 期 2021.12 古个

余英時老師是八月一日去世的,到現在兩個多月。這兩個月來,我常常想起他以 及他所做的事,常感受到他爲人的誠摯,在學術和思想上的活力,在價值問題上的決 斷,竟然不覺得他已經離開我們了。也許是這個緣故,我一直沒有撰寫紀念文字的心 理,這是第一篇正式的文章。在這裡,我想回顧一下余老師和我的個人關係,表達我 對他的追思,也希望能透過這很小的角度,增加大家對余老師的了解。

余英時老師是我的博士班指導教授。我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七年在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從學於余老師,他於一九八七年夏天轉任普林斯頓大學教職的時候,我還沒畢業,他繼續擔任我的指導教授,到我於該年底完成學位論文。我在耶魯和余老師一共相處六年。和余老師先前任教的哈佛大學與後來任教的普林斯頓相比,耶魯大學的學術界訪客比較少,至少在中國研究的領域是如此。在這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我和余老師有相當多的接觸,除了研究上的指導,也有不少思想交流的機會,我可以說是受益無窮。

我在到耶魯求學之前,就對余老師有相當的認識了。我就讀臺灣大學歷史系的時候,從大一起就對思想史發生興趣,開始閱讀余老師的學術論著,在到耶魯大學之前,幾乎他全部的中文學術著作我都看過,有些還反覆研讀,這些著作是我知識成長的最大動力之一。我是一九七四年進入臺大的,這一年,余老師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擔任校長。我因爲特殊的個人機緣,從小有閱讀香港報章、雜誌的習慣(但當時臺灣書報進口管制甚嚴,能看到的很有限),因此上大學後偶爾就在臺大研究圖書館翻覽新亞書院的院刊《新亞生活》,由此也得知老師在教育和行政方面的一些動態。我到耶魯求學,也是余老師促成的。我大學畢業後,去服兩年兵役,在此期間,可能由於臺大老師和學長的引介,他請人傳訊息,表示歡迎我在適當的時機申請耶魯歷史系博士班。由於上述種種因緣,我在到耶魯前,雖然只遠遠見過余老師一面,沒有談過話,感覺並不陌生,到耶魯後,迎接我的則是很大的溫暖。

我在耶魯的前兩年,忙於適應環境,鍛鍊語文,跟老師在課外的接觸不算特別多,但是有機會到他家。我有時和許多老師和同學去參加 party,這經常在年節時分,有時是和當時在哈佛的黃進興學長以及耶魯的康樂學長一起去,在這種情況,通常歡談到深夜。兩位學長在一九八三年回臺灣後,有時我和太太周婉窈會單獨去老師家,有時和別的同學一起去。師母陳淑平女士待我和其他同學非常親切,我也有機會認得余家的兩位女兒。關於余老師,還有一件常讓我心中升起暖意的事。我是博士班二年級下學期才決定攻讀隋唐史的,決定做了以後,老師主動訂購了一套北京中華書局版《舊唐書》送我。我自己只有臺灣鼎文書局縮印的大本兩《唐書》,使用很不方便。通過博士班資格考後,我就鎮日拿著老師的贈書閱讀,爲我的唐史研究打基礎。我在耶魯求學的歲月,學術上的鍛鍊外,也蒙受了長輩的照顧和支持,給了我很大的力量。這兩個多月來,我也常想起師母。

現在回想起來,我跟余老師接觸最密的時段是在耶魯的第三、四年。大概從第三年下學期開始,一方面由於準備博士候選人資格考,一方面因爲自己求知的需求,我幾乎每星期都跟老師見面一、兩個小時,談話的內容絕大部分在學術方面,但有時也涉及公共議題和個人的情況,這樣的日子可能持續將近兩年。我跟他多是在正規的會客時間(office hours)之外見面,這樣才能久談。我自己教書以後,才了解這種情況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謝他的慷慨,也覺得自己很幸運,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半,耶魯中國研究領域的研究生不多,才讓我有可能佔用老師那麼多的時間。

在耶魯和老師相處期間,我還有個比較特殊的經驗:長期擔任老師的課程助教(TA)。博士生協助指導教授的教學本來是常見的,但余老師的情況算是例外,他的指導學生中好像只有我當過他的助教。一九八〇年代的耶魯很重視教學,幾乎所有大學部的講演課都配有助教,因此我有很多機會做這件事,做熟了,不但考卷由我改,連考試題目都是我出,監考、送成績也由我包辦,老師只要來講課就好。這也許是我在耶魯期間對他的一個具體幫助。透過一再聆聽老師的講演課,我得知他對中國歷史有著通貫的了解,這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往後我做研究,無論課題多專門,很自然就會考慮起這些問題或現象的廣幅歷史涵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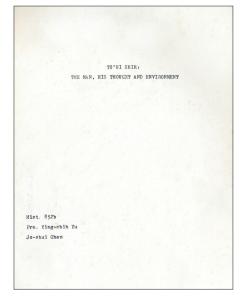
我獲得博士學位開始工作後,離開美國東岸,和余老師的接觸就少了,但無論我在加拿大任教,或之後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他一直幫助我,我碰到困難或有重要的事待決定,經常告訴他,尋求他的意見。這樣的情況

The Shih Ch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in a paradig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cal vriting. However, this paradigs was achieved in an extraordinary process. Whereas the Shih Chi, for the students of history of subsequent generations, is nothing but a great attainment of scholarship, Ssu-ma Chien basically regarded its writing as the sole way to overcome his everlanting and profound sense of meaninglessmes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pometrate the psychology of Ssu-ma Chien.

## I. The Letter in Reply to Jen An as an Unmerance of Inner Voice

The lifelong, profession of Ssu-ma Ch'len was to study other people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the past and in his own age. He only left two documents with autoblographic attributes. One is his letter in reply to Jon An, his old friend. He na was enteneed to death in 91 B.C. for involvement in an event of the same year in which the heir-apparent to Emperor was forced to commit suicide and in which Jon Ante actions were considered delaloyal to the royal family. While in prison awaiting execution in the winter, Jon An sent Ssu-ma Ch'len a letter, asking his to help to save An's life, since Save-ma Ch'len, at that time, was a Symme-shu-ling (Palace Secretary), an attendant of Emperor Wu. Su-ma Ch'len's anneer was megative. He provided two main reasons, in an obscure way. First, although he seemed to "enjoy great honor and favor in the prunuit of his duties." Of h'len was actually merely a mutilated

這是我在耶魯求學第一學期為余老師的課所寫的報告(1981、82年之交),封面頁已經遺失,記憶中,題目是"The Inner World of Ssu-ma Ch'ien"(司馬遷的内心世界)。



這是我在耶魯求學第二學期為余老師的課所 寫的報告封面頁,主題是東漢後期思想家崔 寔。

持續到二〇〇〇年左右。從那時起,我儘量自行解決自己的難題。余老師是位熱心,關心他人、樂於助人的人,我受惠於他已經很多了,我覺得應該儘量自己創造能量,做對學術、教育、社會有益的事。

29

古个

投入專職的教研工作後,我和余老師有兩次重要的學術因緣。一次和我一九九八年的論文〈思想史中的杜甫〉有關。我的論文投稿給期刊後,接到兩份匿名審查意見,一份一看就知道是來自余老師。這份意見寫得很直白,內容非常深刻,指出了文稿中的具體錯誤和不足之處,並對一個關鍵論點提出改進意見。我在論文中主張,杜甫雖然有醇儒的形象,他的「風俗淳厚」的政治社會理想其實含有濃厚的道家意味,我舉了不少詩文爲證。但審查意見指出,我忽略了一條最堅強的證據:〈變府書懷四十韻〉中的「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且殭屍。」我原來就注意到了這幾個句子,也覺得是很強的證據。但這些詩句的意思有些複雜,我擔心解釋費力,如果講得不好,反而於論點有傷,因此只舉其他文意顯豁的例子。

我看到余老師舉出〈變府書懷四十韻〉,非常吃驚。〈變府書懷四十韻〉雖然是名作,但長達八十句,意念紛繁,「大庭終反樸,京觀且殭屍」隱藏其中,讀者很難注意到它的政治思想涵義,應該也沒有任何學者提過。余老師看到我論文中的特殊論點,居然能從數量龐大的杜詩中舉出關鍵證據,令我嘆服,我當然依此修訂文章。這份審查意見反映了余老師寬廣而精深的學術風格。老師沒有發表過有關唐代的專門研究,但他對唐史很多的重要問題都有深入的認識,對唐代詩文尤其有造詣。我的論文利用詩作進行思想史的探討,在學術界很罕見,就我個人而言,更是實驗性的作法,不是很有自信。余老師的批評和指教不但提升了論文水準和論點的有效度,事實上也肯定了論文的基本方向,令我安心。我研究唐代思想史,以士人爲對象,唐代士人中文人地位最高,最具影響,我的研究必須進入文學作品的內部,但我無此準備,只能逐步摸索,在這個過程中,老師的審查意見是重要的回饋。我從來沒有和余老師談起這件事,但心裡非常珍惜這最後一次的研究指導。

另一次學術因緣涉及他的最後一部學術巨作《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2014)。這本書的主題是古代中國思想的誕生——如何從政教不分的前思想過渡到具有獨立性的諸子思想,對這個重大的問題,余老師曾經在〈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1978)一文有初步的討論。後來他就此寫了兩篇英文稿,一直沒發表,但我都拿到了稿子。我看了寫於一九九九年的第二篇長稿之後,印象深刻,很希望該文能早日問世。二〇〇五年前後,我主編史語所的《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邀他把英文稿的成果寫成中文,他立即允諾。結果,經歷很長、很複雜的過程,成就了《論天人之際》這本書。這本書論證精妙,思入微茫,無疑是經典之作。但在撰述過程中,出於各種原因,包括健康上的因素,余老師非常辛苦,這是我深感歉意的。

在過去十年,余老師和我還有兩次在公共事務上的交集。第一次是二〇一四年三月。在當月二十三日,太陽花運動期間,我和十幾位學術界同仁在徐州路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召開有關「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記者會,提出共同聲明,也稍微表達各人的意見。記者會在下午舉行,當天早上,媒體刊出余老師〈臺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支持學生的行動,希望愼重處理服貿協議。在當時的氣氛中,余老師的文

章引起很大的震動。我中午到記者會會場後,主 持人希望我能對余老師的看法有所闡釋,我於是 臨時改變談話內容。我從價值觀的角度,來說明 爲什麼遠在美國,從未長居臺灣的余老師會這麼 關切服貿問題。余老師的文章說得很清楚,他擔 心臺灣的自由民主會受到傷害。我認爲,這個堅 定立場的背後有著以人爲本的基本價值,余老師 心目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群,而是具體的生 活中的人,這些人的意願和經驗不能被外於他們 生活的觀念或效益所取消,而自由民主是最能保 護人的。余老師在文章中說,他曾經和他所信任 的臺北友人們誦電話,詢問反服貿行動的情況。 我偶爾會和余老師通電話,大多談生活起居的 事,不常涉及學術或公共議題,印象裡,在老師 文章發表之前,我不曾和他討論過服貿協議,事 後可能談過,但沒告訴他我對他的思想的體會。 我對老師文化觀和政治觀的認識,不全出於他的 文章和訪談錄,也有從私人談話得來的成分,有 機會也許可以做些系統的探討。

另一次在公共事務上的交集,是在二〇一九年五月三日中華文化總會舉辦的「五四運動 100 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反思」圓桌論壇。主辦單位事先訪問余老師,在論壇播放錄影,我則以「自由民主的自強與防衛——從五四自由主義傳統談起」爲題,發表現場談話。這是我和余老師最後一次「同臺」,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和他在同個場合就公共議題表達看法。雖然我們沒有實際在一起,這還是非常珍貴的回憶。

近年來,《余英時回憶錄》在二〇一八年底出版也激起了我對余老師的回憶和種種相關心緒。 我在耶魯和余老師談話,除了學術,老師有時也會提自己以前的事,這主要是因爲我原來已經廣讀他的作品,對他略有了解,他談這些並不突兀。他跟我談的事情,很多後來出現在他的回憶文字如〈我走過的路〉以及回憶錄,讀來倍感親切。舉例而言,他生命極重要的一次經驗是,一 \*\*Identifier 4.084 (69008), ROMANTIC PORTICES: THEORY AND PRACTICE.

Cyrus Hamlin.

The 90-35 Not CEF 1(21)

For description see under The Literature Major.

\*\*HEBREW\*\*

(Nes under Near Eastern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HISTORY

(INCLUDING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Director of Undergraduate Studies: two Barne [17], Beatrice Bartelt [87], 202

HOS.

\*\*HORITORY THE DEPARTAMENT OF HISTORY

PROFESSORS.

JOSEPH AND STREET STREET, 100 June 1 June 2

HOS.

\*\*BRACIETY OF THE DEPARTAMENT OF HISTORY

PROFESSORS.

JOSEPH AND STREET, 100 June 2

LONG HISTORY

L

耶魯大學 1984-1985 學年課程手冊歷史系 資料首頁。本頁列有歷史系教師名單,除 了余英時老師,還有多位史學名家,包括 當時還年輕的 Nancy Cott(婦女史、性別 史)、Linda Colley(英國史)和 William Cronon(環境史)。義大利史家 Carlo Ginzburg 這一年也來耶魯客座任教。

```
*History 4528 (16662), Islamic Rivival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bbas Annuar.

Not CRF | H(o)

An examination of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intellectual recends with broad socio-political impact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ocusing on two processes of intrinsic decline and current influences; orthodoxy and hererodoxy; the district of the control o
```

History454b/865b 是余老師在 1984-85 學年第二學期開設的中國思想史課程,我是這門課的助教。

Yale College Programs of Study 1984–85

31

古个

九五〇年元旦,他從深圳過羅湖橋到香港探親,過橋那一刹那,「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回憶錄》頁 93)。余老師當時並沒有以香港象徵「自由」的意識,他後來一再反思:爲什麼有這樣的反應?關於這件事及其前後牽聯,我在耶魯時就聽過。當然,有了回憶錄,對老師的認識就遠比以前完整了。從回憶錄可以看出,余老師從大學時期開始,就同時是公共知識分子和以學術爲志業的學子,在他於一九五六年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之前,已經就公共議題寫了差不多 60 篇文章,當時二十六歲。余老師的這個特點,一直維持到晚年,可以說是他生命的本質。這裡附帶說幾句話。余老師早年的思想和評論文章幾乎全發表在香港的雜誌,由於當時臺灣對報刊進口管制很嚴,現在臺灣的圖書館很難找到這些刊物。臺灣的圖書館缺乏一九五〇至八〇年代的香港刊物,是我們圖書收藏的一大缺漏,嚴重影響我們對戰後香港以及離散中國知識人的認識和研究,應當設法彌補。

關於余老師的性格和待人處世種種,各方的文章很多,他離世之後,回憶文字中尤其多這方面的描寫。在我的心目中,老師是一位質樸的人。余師母常說,老師是鄉下人。老師在都市出生,但從七歲(1937)開始到十五歲(1945)的成長期,一直住在安徽潛山官莊祖居,是十足的鄉下。他講義氣,重然諾,對答應的事念茲在茲,全力以赴,就是鄉下文化好的展現。老師也是超脫的人,名利心淡薄。就世俗的眼光來看,老師事業成功,名滿天下,說他淡泊名利,好像有點虛假。但這確實是我的感受,是我認識他幾十年,最常聞見的意態。在某種意義上,他是有宗教感的人,不要在表面上過日子。作爲余老師的學生,還有一點要提,他讓學生自主發展,只有幫助,沒有要求,這是我要感謝也覺得幸福的。

我第一次知道余老師,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當天他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屆院士,我在電視上看到新聞。我從來沒有聽過他的名字,沒想到他後來成爲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從大一開始閱讀他的著作,我的學者養成教育主要是在耶魯受的,在我的工作和思考上,他的價值和學術成果一直是重要的支撐,從來沒有止息。余老師資質出衆,但努力不懈,不斷用他的才能幫助世界,增進人們的歷史與文化認識。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由於時局的緣故,他的心情顯然是不好的,但他相信,人世終究要按照一些道理來運行。余老師留下龐大的學術和思想遺產,如果善加運用,這些資產會有助於我們開創更合理的未來。我個人覺得,紀念余老師最好的方式,是各人依照自己反省過的理念,持續盡責工作、生活。以我對他的了解,這會是他首肯的方式。

作者附識:過去十餘年,我曾經寫過幾篇關於余英時老師的回憶,最主要的是:〈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2009)、〈有關余英時老師的回憶〉(2019)。本文希望比較完整地回顧我生命歷程中的余老師,以爲對他的紀念,因而有取材於上述兩篇文章之處,但已儘量避免重複。